

# 「銳實力」概念於「後」中國崛起時期之理論化探究

王 宏 仁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 摘要

「銳實力」概念從 2017 年出現至今，已經引起國內外廣泛的討論。此概念指出，中國或是俄羅斯等威權主義國家，近幾年透過媒體、網絡等等不同管道，試圖操控新聞、編造假消息、滲透民主國家的政治體制，已經對許多國家造成威脅。而這樣的行為，與以往過去吾人所熟知的各種權力概念—例如軟實力—有所不同，因此，需要另外提出新的概念來形容這種由威權主義國家所實踐的新作為。然而，目前對於「銳實力」的探討僅停留在表面的、媒體式的討論，缺乏更為理論化、系統性的文獻檢閱。有鑑於此，本文試圖將「銳實力」概念放在一個「後」中國崛起時期中進行理論化探討，並透過現有國際關係文獻中對於權力面向的各種討論、過往／近期對於中國崛起現象的理解、以及中國外交政策實踐的成效，來重新檢視「銳實力」的意義。本文認為，唯有透過相關議題背景的梳理和檢討，才有可能避免讓「銳實力」概念成為一種彰顯特定（西方）政治立場、或政治正確的媒體宣傳工具。

**關鍵詞：**軟實力、銳實力、後中國崛起、理論化

\* \* \*

## 壹、前言

「銳實力」(sharp power)概念的出現，最早是於 2017 年 12 月初由兩位美國智庫研究員—國家民主基金會的沃克(Christopher Walker)與盧德偉格(Jessica

Ludwig) 一所提出 (Walker and Ludwig 2017)。之後陸續受到西方媒體的關注與引用 (The Economist 2017a; 2017b)，直到最近國際關係學術界開始將之進行較為系統化、理論化的討論，並且與過去相關的概念—例如其他的權力面向討論—進行比較整理。本文認為，此概念的出現涉及三種不同的議題背景討論，有必要藉此做出更進一步的說明。第一種是關於概念創造的問題。「銳實力」概念推出的時間至今，其實相當短暫。是否該概念與我們過去所熟知的其他概念相比—例如硬實力、軟實力、巧實力等等—有其獨特的差異性，或僅僅是同一種概念的性質、抑或是分享了類似的概念屬性，都已經在學界內引發討論。特別是，銳實力與先前吾人所熟知的其他權力概念不同：前者非常明顯的、強烈地指涉特定政權型態（即，當今威權國家）、特定國家（中國與俄羅斯）的某種負面外交實踐過程；後者往往已經被視為是一種普世的、通則性的歸納稱謂，即，一種具有科學意義、理性運用的工具行為，只要符合該定義條件的所有行為均可稱之。例如，凡是一國有能力使用強加的方式（例如武力）迫使另一國改變其本來欲行使之行動，吾人便可稱前者正在使用硬實力，無論該國是否為民主國家、是否為大國或小國、抑或是哪個文化歷史脈絡下的民族國家（亞洲的日本或是歐洲的法國）。也因此，這裡的「該國」變成是一種非常抽象的概念，在理論上並不局限於任何國家行為者，或甚至非國家行為者也能適用。相對的，目前討論的銳實力概念，並非是從一個廣泛的、長時間的國家行為實踐之後所歸納出來的結果，而是特別針對目前世界上少數僅有的非（西方）民主國家、前冷戰時期共產主義國家、（新興）大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所做出的判斷與觀察。以至於「銳實力」這個概念是否只該專屬於中國與俄羅斯，或是專屬於非民主政體（特別是當代威權主義國家），抑或是民主國家中若其外交作為也符合銳實力概念的定義，能否也稱之為是銳實力的運用，目前尚無定論或共識。而這些問題也沒有在沃克（Christopher Walker）與盧德偉格（Jessica Ludwig）當初的研究報告中獲得解答。本文認為，這也就是為何截至目前為止，「銳實力」概念常有被誤用或濫用為服膺於特定政治立場的原因之一。

「銳實力」概念的出現，衍生出來的第二個議題背景討論是關於當代對於中國崛起現象的評價與解讀為何（石之瑜、張登及 2009；朱雲漢、賈慶國主編 2007；吳玉山編 2018）。中國崛起這個現象，從歷史或文明的角度而言，已經歷經數次，但唯獨冷戰之後的崛起是被鄰近國家或甚至西方世界較多視為是一種政治與經濟利益的衝突（Wang 2004）。而冷戰初期的中國崛起現象，也早與今時今日有所不同。當初國際社會或是西方世界尚未將中國視為是一個大國看待，但無疑是將中國預設為未來最大的威脅或挑戰（Bernstein and Munro 1997）。在那個時期，當

既有西方體制對於中國加入國際社會充滿信心之時，中國崛起充其量只是一種體制「適應」（accommodation）的問題（Ikenberry 2008），甚至時至今日的威脅感只是一種過度反應，而忽略了西方體制內本身所存在的問題（Ikenberry 2018）。但若是既有西方體制對於中國崛起的認識是從零和競爭的角度言之，則中國發展的本身與其過程，就已經成爲一種威脅（Allison 2017; Bernstein and Munro 1997; Chang 2001; Storey and Yee eds. 2002）。另有一段時間中，西方世界對於中國崛起的觀察，並非如此物質性、零和的。亦即，不將中國崛起當作是一種政治或是經濟上的「硬實力」（hard power）衝擊，而是視之爲一種軟實力（soft-power）的表現（Lai and Lu eds. 2012）。早先，軟實力標榜的是，利用說服力而非武力的方式來影響他國的行爲。但是慢慢地，中國這種軟實力型態開始被理解爲其背後意圖是「心懷不軌的」，所以又形成一種「魅力攻勢」（charm offensive）的威脅（Kurlantzick 2007），並且於近年開始被認爲轉向成一種試圖操控民主國家內部資訊的「銳實力」。

在經過 911 之後的美國反恐戰爭、2008 年的全球金融風暴、2010 年中國開始超越日本成爲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等一連串象徵意義的事件後，中國作爲世界主要大國之一的角色，似乎已經無庸置疑，取而代之的討論是如何接受它、與它好好相處、抑或是改變它。本文將這段時間特別視之爲「後」中國崛起時期，換言之，中國崛起已經不是會不會發生的問題，而是，我們已經在這個崛起事實之中生活，並且與之共存，甚至開始想破壞之、逃離之。「後」中國崛起這個現象已經成爲其他國家在中國不斷擴張（無論是經濟、軍事、抑或是網絡科技）的過程之中，透過個別國家國內政治的重組而必須面對的一項新議題。在「後」中國崛起的時期中，無論大國或小國，都越來越仰賴與中國的交往來增進自身的國家（經貿）利益，但這往往賦予中國更多的影響力，特別是對於中國在意的某些議程堅持（例如，一個中國原則），回過頭來又影響了先前的相互依賴關係，導致目前各種不同的抗拒、脫鉤（decouple）的活動正在世界各地產生。本文認爲，這樣的過程已經改變了中國與世界、或說是世界與中國的原初雙方所設定的關係了。

「銳實力」概念出現後所涉及的第三個議題背景，是關於中國大陸外交實踐的問題。本文認爲，這主要是與中國過去十多年在「和平主義」論述推動上的失敗有關。過往對於中國「和平主義」論述的認識，向來與所謂的中國「軟實力」研究有密切的關聯性。即，過去研究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探討中國大陸如何藉由「軟實力」的相關工具，去推動或是完成其所欲推行的單邊「和平主義」論述（王宏仁 2017）。然而，此推行過程在 2013 年之後，開始在西方社會中出現不少的質疑，

特別是對於中國「和平主義」論述背後的動機，相繼提出批判與警訊（Callahan 2013; Herrick, Gai and Subramanian 2016; Okuda 2016）。從歷史緣起來看，2003 年 10 月，前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在博鰲論壇上首次提出「中國和平崛起」的概念。隨後，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便於 2003 年 12 月 10 日的哈佛大學演講中正式提出「中國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要義為何的演說，而到了 2005 年中共中央決定將「和平發展」代替「和平崛起」作為對外的主要論述。無論是「和平崛起」或是「和平發展」，在一連串的外交實踐過程中，以 2004 年 11 月成立的孔子學院最受到矚目。學院創立的初期，是以在世界各地（特別是歐美地區）的大專院校設立語言與文化教育中心的合作方式來進行。很多西方的學生因為對於東方或中國文化的憧憬，加上畢業之後到中國大陸就業的經濟誘因，使得不少人趨之若鶩地參與孔子學院的語言課程、文化活動、學術會議等等。但在實踐的過程中，基於許多政治因素，漸漸開始有國家發現到孔子學院正在不斷地扭曲我們對於中國過去的歷史認知，甚至成為替中國政府在當地社會進行情報工作、監控海外華人言行的工具（Pomfret 2018）。

除了孔子學院外，中國政府也加強一系列的和平主義表現，包括所謂的「熊貓外交」、積極參與多邊經貿組織或活動（例如「世界經濟論壇」的參與）、對於非洲國家的經濟援助、擱置領土爭議並強調共同開發（例如南海島礁）、簽署巴黎的環境協定、「帶路政策」的投資等等。但這些都陸續製造出更多對於中國和平主義質疑的聲音：例如，「熊貓外交」變成一種商業交易、對於保育的擔憂、甚至增加授予國的飼養負擔（Hogenboom 2013）；國際經貿活動的參與卻引來對中國市場開放性、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問題（WTO 2018）；對於非洲國家的援助招致「新殖民主義」、「新帝國主義」的批評（Lumumba-Kasongo 2011）；原本的擱置領土爭議和共同開發，卻演變成軍事基地的設置（CSIS 2018）；在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護甚難取得平衡的情況下，導致各種霧霾、水資源、食品安全的問題擴及周邊國家；以及，帶路倡議似乎對某些地區已經變成了所謂的債務陷阱，進而引發西方媒體將中國的對外經濟影響形容成為一種「債務外交」（Feldshuh 2018）。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國政府雖仍是宣稱持續推動和平主義、和平政策，但吾人所觀察到的是，除了這些和平作為或政策招致越來越多負面的回應與批評之外，中國方面似乎也同時展開較為霸道的（assertive）作為（Swaine 2010），甚至運用起當前西方世界所擔憂的「銳實力」策略，試圖操控民主國家內的資訊內容、分裂社會價值。由此可見，中國的和平主義往往伴隨著強勢作為，後者已經喧賓奪主，改變了各地對中國的美好想像。

本文藉由以上三種議題背景的介紹，先將「銳實力」概念進行情境化，以幫助讀者在一個宏觀的但是具有特定情境的框架之中來理解。此理解除了反映出西方國際關係學界長久以來對於「權力」（power）概念的執著與重視之外，更涉及到長久以來（特別是冷戰之後）西方世界對於中國崛起後一系列的變動觀點，以及中國外交政策在實踐上的成效。在這樣一個複雜與動態的情況下，本文於以下進一步探討「銳實力」與傳統「權力」概念討論的關聯性、與過去／近期對於中國崛起研究的結合，以及強化將來「銳實力」概念在理論建構上的可能性。本文認為，依照柯利爾與梅洪所提出的「輻射型範疇」觀點來研究「銳實力」概念，較能幫助吾人在更多的實際案例中去觀察此概念與其他過往權力概念之間的相同與相異部分。此外，本文不認為「銳實力」概念的實踐，只能由特定國家或特定型態的政體所執行，況且，國家客觀物質權力／實力的大小，不見得與「銳實力」大小具有邏輯上的必然關係。但是，不可否認的，目前國家在當前的國際政治結構下，仍是主要的行為者。最後，「銳實力」如同其他權力概念一樣，理應具有多種面向與性質，但本文特別關注到未來對於「關係」面向的發展性，即，到底「銳實力」可以改變、創造、決定或破壞了怎麼樣的行為者之間的關係狀態。

## 貳、「銳實力」概念的理論分析與再議

首先，對於「銳實力」的定義，沃克與盧德偉格在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截至目前為止，應該將威權政體的『軟實力』歸類為『銳實力』，而後者穿透、滲透或是貫穿目標國家的政治與訊息環境」（Walker and Ludwig 2017, 6）。在兩位作者其他的文章中，也很一致地運用此定義，並且在此之上加入了更多的屬性形容，包括像是「銳實力」如何產生「分散力」（distraction）、「操弄」（manipulation）、「自我審查」（self-censor）、「壓迫」（suppressing）、「吸納力」（co-optation）、「利用」（exploit）、「灌輸」（inoculate）、「顛覆」（subversion）等等的行為特徵（Walker 2018; Walker and Ludwig 2018）。當「銳實力」由此定義出發並且被不同人重複引用或討論時，此概念漸漸衍伸出更多的負面屬性，包括，具有一種「威脅」（Koetse 2018）、「脅迫」（coerce）（The Economist 2017a; 2017b）、資訊「散播」（peddling）、「霸凌」（bullying）、「恫嚇」（intimidation）等等的性質（Singh 2018）。

由上述「銳實力」概念所衍生出來的各項屬性，對於吾人了解「銳實力」這

個現象是相當重要的。首先，這個「銳實力」概念原本就是基於特定的經驗案例——中國與俄羅斯兩個威權體制——所形成，但是，這個概念有多大的程度和彈性可以進行概念化，也就是利用跨案例的比較方式，以新的案例來驗證原來的起始類型？這個問題已經涉及到美國政治學家薩拖利（Giovanni Sartori）所提出的「概念旅行」（concept traveling）與「概念拉伸」（concept stretching）的問題。根據薩拖利的看法（Sartori 1970），在比較政治的領域中，比較的實質其實就是進行概念在不同案例中適用性的討論，而這種跨案例的比較就產生所謂的概念旅行的問題。當原本是根據特定經驗所形成的概念要能夠應用到更多其他的案例上之時，又會有概念拉伸的問題。對於薩拖利而言，概念本身應該是要有清楚的特徵、有明確的概念界線，但是，在不同的案例中因為不同的脈絡情境，概念本身的屬性以及概念本身能夠適用的範圍，卻是呈現「逆變化」（inverse variation）的關係（Angeles 1981, 141; Sartori 1970, 1041）。在薩拖利的框架中，概念本身具有延展性（extension）與屬性（intension），前者指涉概念所能夠適用的範圍高低，後者則是關於概念本身所可以包含的意義數量。當概念所包含的屬性要能夠越多，則其能夠適用的案例或是說範圍越低，因為不是所有的其他案例都可以如同原生的案例一樣符合所有特性。在此種條件之下，到底「銳實力」所擁有的具體定義屬性有哪些？是否前段討論的這些概念都適用？抑或是只是暫時適用在特定案例中——例如中國與俄羅斯——但是當要進行跨領域的比較時，不見得其他案例國家（無論是威權國家或是民主國家）均能符合目前所有關於「銳實力」已經發展出來的屬性？這些問題都尚未在文獻中獲得討論。

其次，如果說薩拖利對於概念的要求本就過於嚴苛——即，追求一種清楚、明確的屬性數目與範圍——則是否還有其他對於概念在跨案例研究上的看法？柯利爾與梅洪（Collier and Mahon 1993）便針對薩拖利的概念研究提出修正的討論。對於兩位學者而言，本來概念就是一種分析性的建構工具，研究者不該期待能夠在每個案例中都找到完美的屬性描述。柯利爾與梅洪利用韋伯的理想類型（ideal type）來描述並且指出，大部分的概念屬性，本來就無法被所有的跨案例所共享，我們在進行概念的跨案例比較分析之時，頂多是藉由在通則化某特定概念的過程中盡量找出那些與理想類型相關的元素。這些元素被柯利爾與梅洪稱之為「家族相似性」或是「輻射型範疇」（Collier and Mahon 1993, 846-852）。這兩種類別均是重視跨案例之間，能夠滿足某特定概念的程度性區別，並非要求所有概念之下的定義屬性都要同時存在。根據這種觀點，假設「銳實力」屬性具有六項屬性特質，當我們要將「銳實力」開始進行跨案例的比較研究之時，就不是去預期六項特質都要同時存在於跨

案例中才能稱之為有「銳實力」的現象發生。而是，很可能在第一個案例中只有某五項屬性被發現，在第二個案例中是另外五項屬性被發現，而第三個案例又是其他五項屬性。屬性在跨案例中的呈現，應該被容許有程度上的差異，這個差異是回過頭來解釋在不同脈絡之下同一個概念可能表現出來的不同概念屬性。如果說不同案例中的概念屬性不必要共享所有的概念屬性特徵，那麼這些概念屬性彼此的相關性為何？

柯利爾與梅洪認為，「輻射型範疇」的提出可以有助於解答以上的問題。因為在「輻射型範疇」中，案例中的各個屬性之間，雖然不必然共享同樣的屬性特質，但是它們個別之間會對應一個核心的範疇，與其之間的關係構成了概念在跨案例比較中的適用性。以「銳實力」這個概念來說，是否有哪些核心的屬性構成了何以為「真的」「銳實力」概念？而在這個核心價值之外，有沒有哪些單一特性也可以構成了某一種特殊的「銳實力」概念？例如屬於中國式的銳實力、俄羅斯式的銳實力？由於「銳實力」是一個新的概念，吾人尚且難以定義，但若是拿傳統的政治學概念來對照，例如「民主」來討論，則目前文獻上已經多多少少對於何謂（真實的）「民主」有比較清楚的概念（即便仍有很大的辯論空間）。此外，由於民主概念在實踐的過程中因為不同國家或是地方文化的差異性，也產生出像是「參與式民主」、「自由主義民主」、「全民民主」、甚至是「社會主義式民主」等等類型。藉此，一個比較強調接近理想型的「真實」概念因此可以出現，又能夠與強調特殊性、具有實踐意涵的概念做出區隔，讓一個如同「銳實力」的概念不會因為進行跨案例比較之時（概念旅行），開始產生出概念拉伸的困境。本文建議，有沒有可能將「銳實力」的概念放在各種實踐型態當中去比較，藉此發展出各種樣態的銳實力類型，而非只有一種單一的銳實力認識。

另一個值得在「銳實力」概念層次上進行討論的問題，是關於「實力」或「權力」（power）的定義問題。首先，銳實力的使用者是否只能屬於國家，如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定義，大多只有指涉中國和俄羅斯等威權國家及其行為，還是，銳實力也是可以被個人、一個團體、或是廣義而言的任何行為者（actors）所擁有？個人可以是網絡駭客、商人、僑民、學者、學生、政治領袖等等；團體可以像是伊斯蘭激進組織、媒體、孔子學院、詐騙集團；任何行為者則是特別強調國家以外的行為者，例如非政府組織 NGOs 以及其他上述所指涉的團體。依照沃克與盧德偉格原先在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定義，所謂的「銳實力」是強調威權政體所「塑造出的影響力」（influence efforts），試圖針對其他國家—特別是民主國家—所進行的政治與資訊環境的滲透或操控。在此定義之下，似乎只有國家—具體而言是這些威權政

府一能夠運用「銳實力」資源，而其他行為者例如學生、學者、商人、媒體、僑民、駭客、詐騙集團、恐怖主義分子等等，只能是受到政府所控制的代理人而已。這樣的理解其背後有一個先驗的預設是，威權政體治理之下不太可能會有獨立自主的公民社會或是人民，因此，可以獨立於政府控制之外的行為者是難以想像的。問題是，如果吾人希望將「銳實力」此概念理論化與通則化，則「銳實力」沒有理由不能同於其他既有的權力概念—例如硬實力、軟實力—可以由不同的行為者所掌握，即便目前國際關係的主要行為者仍是主權國家。換言之，特定國家可能是目前「銳實力」的主要運用者，但是在邏輯上並不該排除其他行為者的角色。

其次，「銳實力」該以何種角度來測量的問題。在早期國際政治的討論中，所有的權力概念（power）是被當作一種物質資源來看待，因此發展出利用了解「國家權力的要素」來對「權力」一詞進行分析的途徑（Morgenthau 1985）。根據這種看法，權力的衡量是可以透過人口、土地、經濟發展狀況、軍隊數量等等來界定大小。當一個國家在這些要素的加總上面累積出相對的數量時，通常會被認定為具有相對較大的權力或國力，例如美國。抑或是，當一個國家對於某要素享有極大的數量或發展之時，特別是在軍事力量上，也可以被認定為具有相對較大的權力，例如北韓對於軍事力量的集中發展。有鑑於此，「銳實力」的衡量與認定能否從資源要素的權力角度來分析？比方說，「銳實力」實力的大小也是受到該國在國家權力要素上的完備與否、數量多寡、或是軍事力量的發展程度來決定，即便「銳實力」就定義上來說主要是對於政治與資訊環境操控或滲透的問題。根據奈伊（Nye 2018）看法，「銳實力」其實應該被看作是硬實力的一種，而不是軟實力。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硬實力是一種資源，而軟實力不是。根據臺灣學者張登及的看法，在國際關係當中，一個國家所掌握的物質性基礎的大小，不見得反映在其實力或是影響力的大小之上，而這裡所產生的問題是：

「奈伊加入『銳權力』的討論後，卻顯示原本『軟權力』說法的內在矛盾。『軟權力』之說一方面堅持權力與能力不可劃等號，有資源未必有權力，更不用說『硬權力』的資源與『軟權力』的資源時常有不對稱共存的情形。另一方面，他似乎也同意杭廷頓的說法，與美國主流學界保持一致，認為『軟權力』資源的基礎，竟是『硬權力』的優勢。」（張登及 2018, 129）

因此，是否「銳實力」的大小實際上還是視該國硬實力的大小而決定，似乎還要再



做進一步的討論。換言之，即便都是由威權國家對其他民主國家所進行的資訊操控，若大國有比小國擁有較多的「硬實力」，但是一定會比小國擁有更多的「銳實力」嗎？或是，小國即便沒有「硬實力」資產，是否仍可在「銳實力」方面發展或擁有優勢？抑或是，有的小國可能真的因為硬實力不足，根本無法行使「銳實力」，也沒有辦法擁有「銳實力」這個資產。本文認為，以上這些問題都尚未經過認真的討論，遑論有任何一致性的看法。在此種情況下，「銳實力」概念很容易被濫用。

奈伊（Nye 2018）在這篇文章中對於「軟實力」與「銳實力」的區別還提出了另一項重要的特徵，即，軟實力主要的來源是市民社會。依據此看法，像是中國或是俄羅斯這樣的威權國家不會願意讓他們的社會有表達自由意志的權利，所以根本無法使用軟權力，或是就算使用了，也會如同今日世人所看到的，最後變成失敗的結果。從這個觀點中我們可以發現，權力行使者除了是國家之外，也可以是市民社會，這也正符合傳統政治學對於國家研究、社會研究的區分，以及兩者互不隸屬（並且是對立）的關係解釋。如果接受了這個研究前提，吾人必須要問的是，國家行使的權力和社會行使的權力，是否代表同樣的意義？在傳統政治學中，國家的權力是必須要去規範的，但是社會所行使的權力並不需要，因為後者的強大是制衡前者的保證（Almond and Powell 1978）。換言之，如果軟實力與銳實力的差別在於前者是由市民社會所行使，而後者的權力來源非但不是市民社會而且還是一國想去干預其他國家的市民社會，則銳實力本身就該被注意、防範、警惕、與限制。所以本文認為，真正銳實力的問題在於其權力來源不是市民社會，而非銳實力本身。如此說來，是否如同臺灣學者張登及曾指出，這樣的「銳實力」定義方式，其實又回到某種「規範性價值的優越感」（張登及 2018, 130）。

傳統上對於權力概念的討論，並非止於「要素」或是「資源」的觀點討論。美國學者鮑德溫（Baldwin 2012）與其他學者很早便指出，在國際政治中對於權力的理解，還可以有另一種「關係性」的途徑。鮑德溫以拉斯維爾（Harold Lasswell）和開普蘭（Abraham Kaplan）兩位的觀察為例指出，「權力」其實是有一種因果面向的存在，涉及到行為者之間的「關係」。因此，「權力」其實是呈現出兩個行為者（或兩者以上）之間實際或是潛在的關係，而在這種關係之中一個行為者的行為是會對另一個行為者行為的改變產生影響的。這樣的理解其實是相當接近於當代國際關係中對於權力的理解。在奈伊（Nye 2018）對於三種權力樣態的比較分析文章中定義到，傳統上對於硬實力的理解是，一種藉由強迫、以及收買的方式去影響他人行為的能力；而軟實力則是一種藉由吸引與說服的方式來影響他人偏好的能力；

銳實力則是一種利用操控訊息的方式來改變他人作為的能力。以上三種權力觀點的共同處在於，有一方行為者試圖運用某種方式來改變另一個行為者的偏好或作為，而這樣的動機和過程已經讓兩者之間產生某種權力關係。本文認為，從權力作為一種資源或財產的觀點轉換到權力作為一種關係性的理解而言，面臨到不少問題，值得「銳實力」研究做為參考。例如，當「銳權力」作為一種資源時，擁有該資源的行為者如何可以真正的轉換該資源而成為影響力，而這期間的過程轉換，又該如何衡量？當行為者真正將資源轉變後，並且施加於其他行為者之時，又該如何去測量到真正的權力關係？到底銳實力改變的是一個行為者的什麼部分，比如行為、偏好、政策立場，或是其他？從奈伊（Nye 2018）的觀點而言，如果軟實力改變的是其他行為者的偏好，而且這種改變是一種自願性質的，則銳實力改變的是其他行為者的價值觀，特別是言論上的自由狀況、一種非自願性的結果。不過，這裡不管是奈伊或是鮑德溫在討論權力的關係性時，都似乎太強調工具理性的意義，只是將權力當作一個某行為者對其他行為者施加影響力的一種改變過程，但是卻沒有說清楚這種權力關係是怎樣的一種或是多種權力關係？是否涉及到行為者角色理解的差異、對象不同的變化，以及雙邊互動過程中所產生的變異？諸多的問題反映出，權力關係是會有「規範」的因素存在，而這個規範因素又必須去從國家行為者之間的過去歷史之中去歸納與理解，無法單從某個國家擁有多少物質資源去判斷。

最後的問題是關於銳實力是否可以切割成多種面向的問題。鮑德溫（Baldwin 2012）在討論權力的關係角度的時候提到，如果權力不是視為單一的而是多面的，則當權力的某個面向增加的時候，理應其他面向會相對應減少。關於面向的種類，鮑德溫提出幾種可能，包括 (1) 範疇：即，權力所能影響的範疇可能因行為者的不同而有異。(2) 範圍：即，權力影響所及的對象數目的多寡。(3) 權重：即，權力行使出來的比重或是或然性為多少的問題。(4) 成本：即，權力的行使是否會對不同行為者造成不同的成本，以至於產生出不同的權力行使難易程度。(5) 工具：即，透過哪些方式行為者來展現權力的行使。首先，關於範疇的問題，由於目前的銳實力案例都是針對中國與俄羅斯，並且將兩國的銳實力表現均視為一致，在此基礎可以進一步討論的是，是否中國會在某些議題領域上一例如經貿投資—展現較佳的銳實力影響，而俄羅斯則是在別的部分—例如軍事議題—會有較佳的銳實力影響，則有待檢證。其次，關於範圍的部分，是否中國的銳實力只有在亞洲地區較能夠深入改變目標國內的輿論，但是可能在西方世界中的國家就比較難有影響力，甚至容易招致抵抗。在權重的問題上，當中國或俄羅斯實際上在施展銳實力之時，也就是其目標國相同或是議題相同時，吾人能否說如果有某一方享有較大的機會去完成其目

標，則該國享有較大的銳實力，而另一國則否。關於成本的問題，如果成本因素是銳實力是否行使的主要要素，則對於比如像是中國或是俄羅斯而言，行使銳實力的成本高低到底是如何計算的？同樣地，對於受到中國或是俄羅斯影響的國家而言，成本高低是否會影響該國去配合或抵抗銳實力的影響？又或者，即便銳實力不能迫使目標國去改變其原先立場或是價值（例如中國對於一中原則的堅持、阻撓任何接受達賴喇嘛訪問的邀請），但是仍可以給目標國的任何不配合行為造成一些成本。當成本累積到一定程度之時，是否會進而改變目標國原先不願意改變的立場或是行為。

目前關於銳實力的討論，大多是集中在工具這個面向上的觀察，而在其他面向上則較少著墨。例如，最常提到的是中國如何花了幾百億的美金在世界各地塑造對其正面的輿論看法（Walker and Ludwig 2017），或是利用特定的機構—像是孔子學院—來改變學術界原本的自由風氣，甚至利用（新的）科技工具—像是媒體、電視、網絡等等—來推行特定的議程或是論述，進而製造出假的訊息或是新聞來誤導大眾（Schneider 2019）。到底，「銳實力」可以利用怎樣的工具來執行？比方說，傳統上一國對於另一國國內輿論的改變，可以利用媒體、廣告、遊說團體等方式來進行，而「銳實力」在實踐上有沒有不同的方式，還是重疊甚深？目前來看，有不少重疊的地方，特別是在於媒體訊息運用上。那能不能進一步區分，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有沒有製造所謂的「假新聞」、「假訊息」？如果是，這個真假的問題在多大的程度上其實我們可以理解為是對於一件事情不同的詮釋或解釋角度，但是在何種情況下又是涉及真偽的問題？以上五種面向的討論，除了提醒吾人不要只是單一地看待「銳實力」這個現象外（例如，只關注在工具面向的影響力），還提供我們在實證研究上可以有的觀察指標，進一步將一個政策性或是媒體利用的概念，進行實證性的比較。<sup>①</sup>

---

註① 感謝匿名審稿人對此點的批評，並指出，本文應該進一步提出實證研究的結論而非建議、應直接提出研究的解釋與深度，而非留待日後的作為。作者在此也相當同意，認為本文不足之處在於，缺少進一步的實證考據。主要原因除了在於篇幅限制、經費研究、議題設定、時間準備、資料取得等等問題外，最重要的是，本文最初的設定是希望將「銳實力」概念能在各個理論面向上有所討論，避免侷限在特定的意識形態、價值觀、政治選擇的框架下討論。後者或許適合服膺於外交政策的制定，因為外交政策制定的本身就是追求該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但本文的目的並非提供政策建言，而是希望在知識建構上，特別是國關理論中對於權力（power）概念的省思做出貢獻。這並非表示，實證的研究無法做出貢獻，而是，本文認為，現階段學界對於「銳實力」概念在理論層次的討論過於缺乏且尚無共識（本文餘下部分將進行說明），如果貿然進行實證研究，不但可能沒有適當的理論方向指引，還可能又落入意識形態的鬥爭之中、替不明的政治權力背書。

## 參、當前「銳實力」文獻探討概況與再補充

由於「銳實力」的概念是在 2017 年所提出，因此中外學界關於此概念的深入討論與理論化分析尙付之闕如。目前仍以英文文獻的討論較多，包含媒體、智庫研究員與學者幾種類型的討論。媒體和智庫的研究中提到不少零星的案例，來證明中國或是俄羅斯如何在近期不斷運用銳實力來介入、干涉、或改變西方民主國家的國內政策（The Economist 2017a; 2017b; Financial Times 2018; Foreign Affairs 2018）。英國《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 2017a）在 2017 年 12 月的專刊報導中指出，中國的銳實力影響力越來越大，在澳洲有學者發表不符合中國人意識形態的言論即被要求道歉，不從便被解職。澳洲國會議員中也發現到有些人傾向於發表特定有益於中國之言論。此外，中國投資人的金錢開始大量流入特定國家，產生的效應是這些國家爲了爭取投資經費，內部自然而然開始進行自我審查，導致一些政治領導人、學者、智囊團開始在其原先的基本價值堅持上退縮。根據《經濟學人雜誌》的報導，中國影響他國內政的其中一項目的是，要防止在海外的華人回過頭來破壞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的根基。這顯示出，在所謂的習近平「專制領導」<sup>②</sup>之下，中國國內的政治環境已經產生巨大的變化，開始藉由肅貪反腐之名行鬥爭對手之實，使人權受到踐踏。《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 2017b）的同一期另一篇文章中更針對西方世界應該做出的回應提出建言。該篇文章中指出，中國其實和其他國家在手段上沒有太大的不同，例如，長期以來便試圖利用簽證、補助金、投資和文化產業發展來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但是問題在於，中國最近的行動變得令人更加畏懼，已經對他國形成了顛覆、欺凌、脅迫、自我審查等等不恰當的壓力。該文建議，面對中國銳實力的崛起，西方世界針對中國人民的獵中行動（a witch-hunt）是錯誤的，因爲這樣反過來違背了西方引以爲傲的法治與民主精神。正確的防禦做法應該是，加強反情報工作，並且配合既有的法治與獨立的媒體系統來抵抗中國政府對各民主國家的滲透。

除了美國民主基金會的研究員陸續發表專文討論銳實力之外（Walker, Kalathil and Ludwig 2018），一位服務於印度國防部門的官員也撰文討論中國如何從所謂的「巧實力」（smart power）發展成「銳實力」，以及中國如何利用此「銳實力」來推展其國家利益的一系列手段（Singh 2018）。首先，該文將「巧實力」定義爲

---

註② 《經濟學人雜誌》之用語。

行為者有效同時運用硬實力與軟實力等相關要素，來達成特定目標的能力。例如鄧小平的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箴言，只不過是一種巧妙將硬實力與軟實力平衡的策略而已。至於中國的巧實力何時變成現在所看到的銳實力，對於這位印度官員來說，是從習近平上臺之後便開始。因為習近平所提出的中國夢或是民族復興，以及同時在個人權力集中上的表現，都已經質變了當初巧實力策略中對於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平衡。最後該文指出，中國在運用銳實力的工具有七種類型，包括：(1) 中國對於非洲國家或是紐西蘭等國所施加的政治權力（political power）；(2) 中國對於西班牙、希臘、挪威等等國家政府所採取的逼迫態度，要求對方對中國敏感的相關議題禁聲；(3) 透過像是孔子學院這樣的機構，去教導語言、文化或是宗教等課程，但實際上是從中推銷中國的政策或是特定的看法；(4) 利用大眾傳播工具，例如報紙、社群媒體、廣播以及網絡來塑造公眾意見；(5) 透過提供獎學金讓國外學生到中國就讀學位或是交換，卻是進行思想偏好的改造；(6) 持續監控中國海外的學生或是移民者，或甚至是讓這些學生或移民者成為中國政府在當地的辯護者；(7) 透過金錢收買或是投資的方式，讓當地政要或是意見領袖協助與中國相關政策的推行。

關於「銳實力」在理論方面的探討，可以參見奈伊（Nye 2018）的討論。該文比較有系統性地比較硬實力、軟實力、銳實力在定義上的區別，這也讓很多人釋疑，到底銳實力跟之前講的很多權力概念的差異之處為何。但是，該篇文章並非刊登在一般學術性的刊物之中，所以篇幅較短、討論的深度亦有所不足，甚至也沒有任何驗證資料。奈伊似乎是依靠刪去法的方式來論證銳實力的屬性，即，在奈伊的定義中，銳實力既然不是屬於軟實力，那麼就是硬實力的一種。奈伊的論點在於，他當初所定義的軟實力概念，有一點相當重要，那就是受影響者的個人意願是關鍵。軟實力是利用說服以及吸引的方式，改變受影響者的偏好，而讓受影響者「自願」去改變自己的行為。此外，軟實力的來源必須是從市民社會而來，因為這是奈伊當初觀察美國軟實力來源的依據。依據奈伊的觀點，銳實力一方面不是用說服以及吸引的方式來改變別人的偏好，而是利用資訊欺騙或操弄的方式來達到威脅的目的；另一方面，銳實力是從威權國家所發展出來，自然也不會有尊重市民社會、尊重言論自由的道理，因此，應該被歸類在硬實力的範疇之中。這樣的推論，本文認為其實是相當有問題的，<sup>③</sup>值得我們再去思考銳實力在理論化過程中的角色與內涵。

中文文獻中，相關的學術論文討論更為稀少。目前以臺灣學者張登及（2018）

---

註③ 例如，本文曾經在前面的篇幅討論到，「權力」（power）的樣態和面向可以是相當多元的，而非二元的（若非硬實力，則為軟實力，反之亦然）。奈伊的解釋顯然是一種二元推論。

的〈習時代中共的「銳實力」戰略？概念構成與理論反思〉一文，最為深入。該篇文章針對「銳實力」概念的提出、銳實力與中、美兩國權力發展差異性的關聯性、銳實力由軟實力而來的概念演變、以及未來關於銳實力的研究方向等等議題，進行較為系統性的整理與分析。臺灣研究員黃秋龍（2018）也嘗試藉由中國與歐亞之間在經驗交流上的探討，試圖對於「銳實力」進行較為實證的分析與檢驗。中國大陸方面的研究也較少理論性的討論，大多是一方面認為西方所發展出來的「銳實力」概念帶有陰謀論的色彩，充滿霸權心態與偏見（朱飛虎 2018）；另一方面，則是希望中國方面可以加強宣傳、溝通，以比較正面的方式來回應西方的說法，並且改變目前的「誤解」（王莉麗 2018）。

雖然在目前的中英文學術文獻中，針對「銳實力」的討論仍有限，但是，從這些相關的作品中仍可讓我們重新思考如何從其他的角度來看待「銳實力」問題。例如，銳實力定義中將中國對於民主國家社會內資訊的操控、或是捏造，視為相當關鍵的問題之一。關於資訊操控或是捏造的問題，似乎可以視為一種中國自 2004 年以來對於國際話語權提升的延續討論。王宏仁（Wang 2015）在追溯中國國內對於話語權討論的歷史脈絡之時發現，中國國內對於其國際話語權追求的強烈呼籲始於 2004～2005 年期間，而高峰則落於 2007～2008 年間。這兩個時期對於話語權的追求，都帶有很強的自我認同因素與自我形象因素的驅使。這兩個背後其實都有很強的文化因素在影響。雖然西方世界試圖理解中國崛起過程中對於世界秩序的想像和目標為何，但都帶有特定的認識論基礎。例如，該文指出（Wang 2015），對於中國長久以來建立形象的認識，就是從軟實力的角度切入，但是當認識者眼中的中國開始被引起反感、開始不像是原先軟實力所理解的那個中國的時候，認識者便會以為中國放棄掉軟實力那部分的發展，退回到其他像是現實主義所認識的框架當中。實際上，當初中國看似實行軟實力的過程，可能都不是與軟實力原先定義中的偏好改變有這樣強的關聯，因為，偏好改變是關乎個人的選擇性問題，這在西方的觀念中是一種個人自由的問題，但是在中國文化中，有些東西不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而是跳出個人可以選擇的是非對錯、公平正義的問題。對於後者，中西方學者其實很早就指出這是一種中國文化上的集體意識、集體情感在作祟，影響到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表現。有人稱之為「面子國族主義」或「面子外交」（Gries 1999）、「面子文化」（Huang 1985）、「道德外交」（石之瑜 1994），甚至是一種追求「正名秩序」的過程（張啓雄 2012）。不管是面子、道德、正名秩序的追求，都是在在乎一種中國所提出或想像出來的原則、立場、與秩序能否被他人尊重或接受的問題。一但這種原則、立場、秩序被打破或是一直無法被建立，中國會有一種衝動要

去更正、重塑「錯誤的事實」或甚至是莫名的堅持。根據石之瑜（1994, 45）的研究，「也許正是這種道德至上的風格，使得往後中國的政治活動總是充滿了戲劇性，以致於現實可以被忽視、曲解、虛構甚或捏造，其目的也不過是要表達一些立場。」

除了爭取論述權與文化、銳實力之間的關係之外，公共外交的研究與聯合統一戰線問題，也是銳實力研究應該注意的方向。在早期的外交研究中，幾乎很難發現到對於公共外交的重視，或者僅僅只是將之視為是一種民間的活動（Melissen 2005）。根據梅利森的看法，「公共外交與一般傳統外交工作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主要是討論代表國家的外交人員與其他國際行為者之間的關係，而後者則是鎖定外國社會中的公眾，特別是特定的非官方團體、組織與個人。」

（Melissen 2005, 5）不過，隨著時間的改變以及實踐上的影響，至少在 2000 年左右之後，學界對於公共外交的內涵與定義也有所改變，甚至稱之為是「新公共外交」的出現。公共外交的重新受到重視，部分也與美國 911 恐怖主義攻擊事件的發生有關。但主要的問題還是在於，例如以美國為例，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形象接受度似乎有衰退的跡象，而這同樣發生在其他老牌民主國家身上，因此引發世界各地對此問題的關注，並且認為，傳統上國際關係研究中對於國家角色的過度重視有點不切實際，而另一種重視非國家行為體的軟實力現象則可以從重視公共外交上看到。在此，公共外交成為軟實力發揮的一項重要工具之一，開始強調對於他國公眾輿論、市民社會的重視，也不再將公共外交視為一種國家政府所獨有的外交工具。對於中國公共外交的研究方面，荷蘭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高英麗（d'Hooghe 2005）指出，即便在早期西方世界裡並沒有察覺到中國在公共外交上的實踐，但是其實如果就試圖提供國家形象的企圖心上，中國從 1949 年建國開始就已經在做。不過，如果我們用比較案例的角度來看，美國在重視公共外交的切入角度，與中國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說，美國現今對於公共外交的重視有很大一部分在於傳統安全或是恐怖主義的關注上，則中國在近期的研究是受到其在國際事務參與的急遽增加、以及新安全觀發展的影響（李華 2014）。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中華文化更重視自我形象的問題，或是面子問題（Wang 1999）。也因此，中國藉由不同的外交手段，不但是希望可以塑造出中國在國際上正面的形象之外，這個形象也因為中國歷史階段上不同時間的發展，而有各種不同的形象觀，包括自毛澤東時期的反帝觀、反霸觀、反修觀、發展觀、和平觀、正義觀、道德觀等等。在這些種種觀念的推動過程當中，中國共產黨黨中央的統一戰線工作，扮演相當中重要的角色，因為，它不但替中國在世界各地

推廣中國共產黨所欲建立起的各種形象觀之外，也同時是中國共產黨正當性建立或是正當性維持的一項很重要基礎，即便在現在的習近平時期也是如此（Wang and Groot 2018）。依此而言，在習近平時期對於統一戰線機構的重組與重新重視<sup>④</sup>、網絡安全與訊息控制的加強<sup>⑤</sup>，以及其如何被運用來成為銳實力策略中重要的動員工具之下，吾人是否可以主張，這樣的資訊與輿論的操控方式，充其量表現出中國共產黨一貫的治理手法？以及，目前西方各界所提出的「銳實力」概念，其實反映出中國如何將原本國內熟悉的宣傳和統戰手法，透過經貿實力和高科技強加於外部的國際社會之中。果真如此，欲了解當下的中國銳實力表現，還必須回到早先中共如何從蘇聯學得宣傳手法來進行研究與比較。<sup>⑥</sup>如此一來，當今中國和俄羅斯之所以變成「銳實力」發展的主要來源，也就有其歷史根源上的解釋。

## 伍、結語：「銳實力」研究展望

本文認為，近期對於「銳實力」的關注，其實已經引發許多國際關係理論中對於權力問題的討論，或是，中國研究與中國崛起的問題、中國全球治理的態度、中美關係的發展等等。甚至冷戰結束至今，世人更關注到是否有可能又重新回到自由民主與威權統治兩種意識形態競爭的循環之中。然而，本文認為，今後的相關研究應該更為聚焦。首先，在定義上，如果硬實力改變了行為者的行為、軟實力改變了偏好，則「銳實力」改變了什麼？比方說，當一帶一路的周邊國家開始對於中國的基礎建設投資計畫與文化交流的認知，由一種軟實力的觀點轉向銳實力的觀點，那是代表怎樣的一種關係性變化？而這個變化，又反映出怎樣的內涵，例如是主觀的觀念性改變、還是客觀的物質性改變，抑或是其他？

其次，將來的研究議程能否增進吾人對於中國外交關係更深入的了解？例如，有沒有可能銳實力只是一種威權文化之下的權力需求表現？若從中國儒家文化所揭示的統治關係而言，如果中國在對外的實力展現上反映出一種權力需求，則這樣的需求是否有其宰制文化的根源，可以從歷史脈絡中看出？又或是，在中國外交

---

註④ 2015 年設立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領導小組，並且在多次的組織調整過程中，將人事格局的級別提升。

註⑤ 2014 年先是成立了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2018 年又為了強化決策和統籌協調的職責，改為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

註⑥ 感謝匿名審查者對於此觀點的指教。



的習慣裡，藉由自己在文化中所習以為常的議程來表達自己、論述自己，甚至是糾正他人來合理化自己在國內的形象與正當性。

如果可以先將中國視為單一案例進行完整的論述，則便有基礎進行跨案例的比較與整合。例如，俄羅斯或是其他威權國家在行使「銳實力」之時，是否也有類似的文化、歷史、認同、觀念、物質等因素必須放入討論。在一個理論建構的過程中，如何將不同的案例進行系統性的整合、歸納，先形成所謂野心較低的中程理論建構，實為將來相關研究議程的第一要務。

最後，「銳實力」當初提出的緣由是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這兩個新興威權政體對於民主國家所進行的滲透、顛覆、分裂手段而得到的觀察結論。這與當初美國學者奈伊於 1990 年觀察到美國並非僅靠強制性的手段來吸引全球各地民主社會的支持，進而發展出「軟實力」的概念，其道理是如出一轍。換言之，「軟實力」概念當初的提出也是基於特定國家的實踐經驗，經過多年的討論、辯論與理論化嘗試，才逐漸通則化到其他行為者身上的應用。這個「通則化」其實包含了一種國際關係社會化、學習化的過程。因此，傳統對於「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辯證關係討論（Ashley 1987; Lechner and Frost 2018; Onuf 1989），應該在「後」中國崛起時期進入新的探究。

\* \* \*

（收件：107 年 12 月 31 日，接受：108 年 7 月 25 日）

# Theorizing “Sharp Power” in Post-Rising China

*Hung-Jen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 Abstract

Since its first use in 2017, the term sharp power has attracted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worldwide. The concept has been used to describe how authoritarian regimes such as those in China and Russia use a combination of media manipulation, deceptive information, and social disruption to achieve political goals in targeted (mostly democratic) countries. After reviewing all the significant literature on the subje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harp power concept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than it has received so far. To theorize the sharp power concept, the author considers multiple power dimens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cipline in a general sense, as well as particularly focusing on China's development, and suggests that the concept should not be approached in an isolated manner, but rather, according to a contextualized status that emphasizes connections between existing issues. The concept appears to be a product of the current period following China's emergence as a global power—that is, of the post-rising China age. By examining relevant issues and background data, we can avoid mistakenly using the sharp power idea to represent specific (i.e., Western) political positions or political correctness, as is commonly found in mass media sources.

**Keywords:** Soft-Power, Sharp Power, Post-Rising China, Theorization

## 參考文獻

- 王宏仁，2017，〈中國大陸的單邊和平外交與關係模式：習近平是新轉變，還是胡調重彈？〉，《中國大陸研究》，60 (3)：1-20。Wang, Hung-jen. 2017. "Zhongguo dilu de danbian heping waijiao yu guanxi moshi: xi jinping shi xinzhuanbian, haishi hudiao chongtan?" [Mainland China's Unilateral Peace Diplomacy and the Relationality Model: Is Xi Jinping Articulating a New Strategy, or Just Playing Hu Jintao's Same Old Tune?]. *Mainland China Studies*, 60(3): 1-20.
- 王莉麗，2018，〈中國應正面應對西方銳實力輿論遏制〉，《公共外交季刊》，(1)：66-71。Wang, Li-li. 2018. "Zhongguo ying zhengmian yingdui xifang ruishili yulun ezhi" [China Should Face up the Sharp Power Containment in the Western Media]. *Public Diplomacy Quarterly*, (1): 66-71.
- 石之瑜，1994，〈《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臺北：三民書局。Shih, Chih-yu. 1994. *Zhonggong waijiao de lilun yu shijia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aipei: Sanmin Shuju Press.
- 石之瑜、張登及，2009，〈中國崛起的意義〉，《文化研究》，(8)：193- 212。Shih, Chih-yu, and Teng-chi Chang. 2009. Zhongguo jueqi de yiyi [Implications of China's Rise]. *Cultural Studies*, (8): 193-212.
- 朱飛虎，2018，〈淺論新形勢下我國對外傳播的「輿論場」競爭：以銳實力為例〉，《東南傳播》，(5)：1-3。Chu, Fei-hu. 2018. "Qianlun xin xingshixia woguo duiwai chuanbo de yulunchang jingzheng: yi ruishili weili" [Discussion on the Competition of Discourse Field in China's Exter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Context: Take Sharp Power as an Example]. *Southeast Communication*, (5): 1-3.
- 朱雲漢、賈慶國主編，2007，〈從國際關係理論看中國崛起〉，臺北：五南圖書。Chu, Yun-han, and Qing-guo Jia. 2007. *Cong guoji guanxi lilun kan zhongguo jueqi* [Viewing China's Rise 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aipei: Wunan Tushu.
- 吳玉山主編，2018，〈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Wu, Yu-shan. 2018. *Zhongguo jueqi: lishi yu guoguan de duihua* [Resurgence of China: A Dialogue between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ipei: East Asia Center,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李華，2014，〈國際組織公共外交研究〉，北京：時勢出版社。Li, Hua. 2014. *Guoji zuzhi gonggong waijiao yanjiu* [Study on the Public Diplomac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Beijing: Shishi chubanshe.

- 張啓雄，2012，〈兩岸關係理論之建構：「名分秩序論」的研究途徑〉，包宗和、吳玉山主編，《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市：五南。Chang, Chi-hsiung. 2012. "Liang'an guanxi lilun zhi jiangou: mingfen zhixu lun de yanjiu tujing" [Building up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ory: Approach of Ming-fen and order]. In Zong-he Bao, and Yu-shan Wu, eds., "*Chongxin jianshi zhengbian zhong di liangan guanxi lilun*" [Re-examine the Theory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the Debat]. Taipei: Wunan Tushu.
- 張登及，2018，〈習時代中共的「銳實力」戰略？概念構成與理論反思〉，《展望與探索》，16 (4)：119-133。Chang, Teng-chi. 2018. "Xishidai zhonggong de ruishili zhanlve? Gainian goucheng yu lilun fansi" [China's Sharp Power Strategy in Xi Era: Conceptual Formation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Prospect & Exploration*, 16 (4): 119-133.
- 黃秋龍，2018，〈中國大陸「銳實力」對歐亞治理的衝擊〉，《展望與探索》，16 (7)：133-140。Hung, Chiu-lung. 2018. "Zhongguo dalu 'Ruishili' dui ouya zhili de chongji" [The Impact of Mainland China's Sharp Power on Eurasian Governance]. *Prospect & Exploration*, 16 (7): 133-140.
- Allison, Graham. 2017. *Destined for War*. NY: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 Almond, Gabriel A. and Bingham Powell. 1978. *Comparative Politic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Angeles, Peter A. 1981.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 Ashley, Richard K. 1987. "Foreign Policy as Political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tes*, 13 (2): 51-54.
- Baldwin, David. 2012.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ttps://www.princeton.edu/~dbaldwin/selected%20articles/Baldwin%20%282012%29%20Power%20and%20International%20Relations.pdf> (November 12, 2018)
- Bernstein, Richard, and Ross H. Munro. 1997.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Callahan, William A. 2013. "China's Harmonious World and Post-Western World Orders: Official and Citizen Intellectual Perspectives." In Rosemary Foot ed. *China Across the Divide: The Domestic and Global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 Chang, Gordon G. 2001.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London: Random House.
- Collier, David, and James E. Mahon. 1993. "Conceptual 'Stretching' Revisited: Adapting

- Categorie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 (4): 845-855.
- CSIS. 2018.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https://amti.csis.org/chinese-power-projection/> (November 5, 2018).
- d’Hooghe, Ingrid. 2005.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Jan Melissen, ed.,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lagrave Macmillan.
- Feldshuh, Hannah. 2018. “China Debates the Belt and Road.”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9/china-debates-the-belt-and-road/> (November 12, 2018)
- Financial Times. 2018. “Russian and Chinese Sharp Power.” <https://www.ft.com/content/648187ce-8068-11e8-af48-190d103e32a4> (November 15, 2018)
- Foreign Affairs. 2018. “How Sharp Power Threatens Soft Power.”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01-24/how-sharp-power-threatens-soft-power> (November 15, 2018)
- Gries, Peter. 1999. “A ‘China Threat’? Power and Passion in Chinese ‘Face Nationalism’.” *World Affairs*, 162 (2): 63-75.
- Herrick, Christopher, Zheyu Gai, and Surain Subramanian. 2016. *China’s Peaceful Rise: Perceptions, Policy and Misperception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Hogenboom, Melissa. 2013. “China’s New Phase of Panda Diplomacy.” <https://www.bbc.com/news/science-environment-24161385> (November 12, 2018)
- Huang, Guoguang. 1985. “Renqing and Mianzi: The Chinese Power Game.” In Qiao Jian, ed., *Modernization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 Ikenberry, G. John. 2008.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87 (1): 23-37.
- Ikenberry, G. John. 2018. “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94 (1): 7-23.
- Koetse, Manya. 2018. “On ‘Sharp Power’ & the China Threat 3.0: ‘The West is Mentally Stuck in Cold War Era’.” <https://www.whatsonweibo.com/on-sharp-power-the-china-threat-3-0-the-west-is-mentally-stuck-in-cold-war-era/> (November 12, 2018).
- Kurlantzick, Joshua. 2007.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ai, Hongyi, and Yiyi Lu eds. 2012. *China’s Soft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 Lechner, Silviya, and Mervyn Frost. 2018. *Practic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umumba-Kasongo, Tukumbi. 2011. "China-Africa Relations: A Neo-imperialism or A Neo-colonialism? A Reflection."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10 (2): 234-266.
- Melissen, Jan ed. 2005.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lagrave Macmillan.
- Morgenthau, Hans. 1985.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 Nye, Joseph S. 2018. "How Sharp Power Threatens Soft Power."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01-24/how-sharp-power-threatens-soft-power> (November 12, 2018)
- Okuda, Hiroko. 2016. "China's 'Peaceful Rise/Peacefu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Media Frames of the Rise of China." *Global Media and China*, 1 (1-2) : 121-138.
- Onuf, Nicholas Greenwood. 1989.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Pomfret, John. 2018. "The Furor over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Is Distracting from Real Chinese Threat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global-opinions/wp/2018/07/02/the-furor-over-the-confucius-institutes-is-distracting-from-real-chinese-threats/?noredirect=on&utm\\_term=.08a9ffd25b18](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global-opinions/wp/2018/07/02/the-furor-over-the-confucius-institutes-is-distracting-from-real-chinese-threats/?noredirect=on&utm_term=.08a9ffd25b18) (November 12, 2018).
- Sartori, Giovanni. 1970.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 1033-1053.
- Schneider, Florian. 2019.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of China's Mass Media Events: How the PRC Manages Discourses in Complex Media Environments." In Shei C.,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Singh, Mandip. 2018. "From Smart Power to Sharp Power: How China Promotes her National Interests." *Journal of Defence Studies*, 12 (2): 5-15.
- Storey, Ian, and Herbert Yee eds. 2002. *The China Threat: Perceptions, Myths and Real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 Swaine, Michael. 2010. "Perceptions of an Assertive China."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32: 1-19.
- The Economist. 2017a. "How China's 'Sharp Power' is Muting Criticism abroad and Stealthily Trying to Shape Public Opinion in Its Favor." <https://www.economist.com/>

- briefing/2017/2/14/how-chinas-sharp-power-is-muting-criticism-abroad (December 16, 2017).
- The Economist. 2017b. "What to Do about China's 'Sharp Power'."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7/12/14/what-to-do-about-chinas-sharp-power> (November 12, 2018).
- Walker, Christopher, and Jessica Ludwig. 2017. "From 'Soft Power' to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in the Democratic World." In Juan Pablo Cardenal et al., eds.,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 Walker, Christopher, and Jessica Ludwig. 2018. 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7-11-16/meaning-sharp-power?cid=int-lea&pgtype=hpg> (November 12, 2018).
- Walker, Christopher, Shanthi Kalathil and Jessica Ludwig. 2018. Forget Hearts and Minds.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9/14/forget-hearts-and-minds-sharp-power/> (November 15, 2018).
- Walker, Christopher. 2018. "What is 'Sharp Power'?" *Journal of Democracy*, 29 (3): 9-23.
- Wang, Fei-ling. 1999. "Self-image and Strategic Intentions: National Confidence and Political Insecurity." In 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 eds., *In the Eyes of the Dragon: China Views the World*.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Wang, Gungwu. 2004. "The Fourth Rise of China: Cultural Implication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 (2): 311-322.
- Wang, Hung-jen. 2015. "Contextualising China's Call for Discours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3 (3): 172-189.
- Wang, Ray and Gerry Groot. 2018. "Who Represents? Xi Jinping's Grand United Front Work, Legitim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nsult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 (1122) : 569-583.
- WTO. 2018. European Union Files WTO Complaint against China's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8\\_e/ds549rfc\\_06jun18\\_e.htm](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8_e/ds549rfc_06jun18_e.htm) (November 15, 2018).

